

第六章、結 論

「權威並不神秘，也非自然之物。她形成、發散和傳播；她是工具，以威脅利誘；她建立品味和價值的典範；她實際上和她標榜為真理的某些觀念融合為一。她同時也和傳播、再生產過後的傳統、觀念和概念難以區分。不過，權威是可以，也應該被分析的。」

~Edward Said

「所謂『本源』(origin)可能只是一項偶發事件、一場權力遊戲、一個指向無窮詮釋的中途點而已。」

~Michel Foucault

第一節 國際因素的影響

台灣在一九七〇年代因為喪失中國代表權而退出聯合國之後，國家影響國際勢力的能力銳減許多，但是國家自主性並沒有因此而消失，相反地，台灣在邁向全球化過程中所展現的旺盛對外經貿關係，不但創造了國際欣羨與國內自豪的經濟奇蹟，同時更使得台灣在外交極度孤立下，創造出替代的「準外交關係」，使得台灣能夠繼續保持與國際的聯繫¹，以維持其在國際舞台上的相對自主性。另一方面，台灣社會在全球化腳步上表現出高度跨國流動的人口，形成高度跨國流通的客體與主體 (transnationally mobile objects and subjects)。產生出「我群」與「他群」的分別，再配合其他結構性條件的出現，國族主義 (nationalism) 由然滋生，而這個社會也理所當然地被稱為一個國族 (nation)²。台灣在全球化下的跨國流動中，催化了台灣的國族選擇問題，再加上台灣與國際 (包含中國大陸) 的面對面接觸，配合國際上特殊的結構安排與差異，使得台灣人更加深了「我群」

¹ Donald W. Klein, *ibid*, 1992.

² Ernest Gellner著，李金梅、黃俊龍譯，**國族與國族主義** (*Nation and Nationalism*) (台北：聯經出版社，2001)。

與「他群」的區別意識。第三，台灣的國家機構在面對全球化與國際壓力衝擊時，不僅沒有消失，反而藉此「人」「我」區別而意圖創造新的論述以取得更深厚的支持與國家能力展現，企圖藉此重塑國家在國際社會中的自主性。

因此，台灣的國家角色在一九七〇年代後被國際社會有系統地排斥在外，可是台灣的社會卻與全球化趨勢所創造下的「地球村」緊密結合的情況，存在著極大的鴻溝，這個鴻溝也為台灣的國族問題開創了茲長與激化的空間，並且創造出國家重返國際社會的新渠道。在國家自主性仍存在的情況下，雖然國民黨政府所創造的中華民國體制與中國代表地位面臨日益嚴重的外部危機挑戰，但是，國家機關仍會主動發揮其一定的影響力以爭取更多國家能力，此時，國家機構轉向台灣國族主義的型塑與訴求就是對此結構安排下的反應³。

國際制度的轉變可以用來說明台灣認同現象的轉變⁴。國際制度的關鍵在於它不但型塑了自我認同（self-identification），同時也提供了「他人的認可」（identification by others）⁵。中華民國制度的失敗，讓台灣形成曖昧的國格地位，在一九七〇年代到九〇年代的國際結構轉化中，無論台灣的政府如何自我宣稱是「台灣政府」或「中國政府」都沒有用⁶。因此，造成台灣人「中國人」認同幻滅的原因，除了與興起的台灣本土意識有關外，更重要的是中華民國制度在國際社會的失效，使得台灣政府的中國代表性及台灣人民的中國人認同大量地失去「他人的認可」，因此已經難以再支撐這樣的認同，國家自然轉向新認同的支撐，以維持其既有的自主性。

Krasner認為，一個國家最有力的資產是國際社會所賦予它的司法主權，其他國家願意為它的存在而背書，並放棄在同一領土上主張主權的機會⁷。然而，台灣的中華民國制度在國際社會失效後，台灣就逐漸喪失這項有力的資產，形成

³ 汪宏倫，「制度脈絡、外部因素與台灣之『national question』」，*台灣社會學*，第一期（台北：2001年6月），頁228-233。

⁴ 汪宏倫，「制度脈絡、外部因素與台灣之『national question』」，*台灣社會學*，第一期（台北：2001年6月），頁280-287。

⁵ Berger, Peter L & Luckmann, Thomas, *ibid*, 1990, p.132.

⁶ 這會形成「一中一台」或是「兩個中國」的情況。

⁷ Stephen D. Krasner, *ibid*, 1988, pp.66-94.

一個獨立存在於國際社會的政府實體，但卻不見容於目前國際社會制度，不被國際社會接受的特殊例子。Ernest以共同的受難（suffering）比起歡愉（joy）更容易團結人民的意識，提供國族（nation）集體記憶的基石，而國族的存在，就是一種「每日的公民投票」（daily plebiscite），是經年累月，長期蓄積的心理能量⁸。台灣的國家與社會原本以「中國人」的認同被國際社會所認可的集體記憶基石，在一九七〇年代後被受挑戰。當「中國人」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時，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也在思考另外一套國際生存的辦法⁹。由於台灣被排除在國際社會的「每日否決」（daily votes）新聞事件充斥在國家機構與民間社會間，這些新聞事件在在提醒台灣的政府機關與市民社會面對目前的體制在國際間是「集體不存在」（collective non-existence）的事實，並且提醒人們追求一個被認可的國格的必要性，培養出政府機關對外尋求國際生存空間，對內尋求社會認可的能力，日久之後很容易因為「集體受難」而加深「命運共同體」的意識，而成為塑造新內容國家認同論述的推手。

梯利（Charles Tilly）以戰爭讓人們必須將資源和權力集中起來，並且強化對領袖的效忠，以採取一致的行動，有利於國家的形成為例，說明戰爭不只製造國家，也製造國族（nation），戰爭會使人們產生休戚與共、同仇敵愾以及集體的認同感¹⁰。以台灣的情況來說，長期面臨來自中共的戰爭威脅與外交打壓，無疑對台灣的國家形成和國族形成影響深遠，同時也可以解釋為何台灣的國家能力展現逐漸由「中國代表權」爭奪戰逐步邁向爭取「台灣代表權」重回國際社會的原因。

第二節 汲取因素的影響

史卡區波認為國家機器的合法性取得渠道，最重要的來源並不在於多數國

⁸ Ernest Renan, *ibid*, 1990, p.53.

⁹ 包括了九〇年代中期的各種對「一個中國」內容論述，九〇年代末期的「特殊國與國關係」，以及2000年的「兩國論」。

¹⁰ Charles Tilly & Leopold H. Haimson, *ibid*, 1989.

民的認可或默許，而是政治上強大而且動員起來之團體的支持或默許，如果國家機器不能堅持處理現有的任務，或者表現出無力處理重大危機的話，那麼這些關鍵團體對國家機器的合法性喪失，往往會導致許多報復的行動¹¹。

資本家成為台灣的關鍵團體正式發揮其影響力影響國家機器的時刻，始自於七〇年代台灣退出聯合國之後。由於國民政府失去國際支持之後，台灣與世界的掛勾之處，只剩下經濟與其他非官方活動，而在經濟領域中，大約有 75%~80%左右是台籍人士的企業¹²，因此國民黨政府必須要依賴台籍資產階級與世界掛勾。一九七三年，行政院長蔣經國提出的「實質外交」政策即說明了國民黨政府與台灣企業的依靠¹³。至此開始，台灣企業成為國民黨政府必須依賴，成為與世界發生關係的基礎，而且經濟發展本身也逐漸成為國民黨政府統治台灣社會的一個藉以合法化其統治的現象¹⁴。它一方面可以展現國民黨統治優於共產中國，另一方面可以穩定政治社會秩序。而以台籍為主的資本家團體就逐漸滲透入國家機器中，在八〇年代中期以前與國家機器渡過甜蜜的合作關係，但在同期之後，隨著國家機器無力處理層出不窮反對運動之現象，兩者的合作關係也開始面臨挑戰，資本家在八〇年代末期已經不在鼎力支持國家的政策，出現投資停頓與資金外移的聲浪。王永慶的出走風波充分顯示出奠立在「經濟快速發展」的發展型國家機器的合法性已經出現嚴重危機¹⁵。

王紹光、胡鞍鋼以財政汲取能力做為國家能力的首要指標，這個首要指標將影響國家正當性的基礎；而Jessop將新自由主義風潮下的國家賦予新的意涵與理論，其中，「資本積累」亦被視為新國家機器的改進面向之一，資本積累的成功與否將影響國家機器建立國族主義霸權的重要因素。再比較九〇年代以後的各項經濟數據則顯示出國家機器的轉型成功，資本家在此時已經揮別掉過去不愉快

¹¹ Theda Skocpol著，劉北城譯，**國家與社會革命**（台北：桂冠圖書公司，1998），頁 36。

¹² 中華徵信所在一九七〇年初期的調查資料。

¹³ 蔣經國，**蔣總統言論集**（台北：1978），頁 33。

¹⁴ Alice Amsden, *ibid*, 1985, pp.78-106.

¹⁵ 王振寰將此 1980 年代晚期的國民黨政府正面對國內資本退縮投資與民間社會運動湧現等兩大正當性危機。

的合作經驗，與國家機器正進行緊密的合作，進行國家內部新一階段的資本積累工程。度過八〇年代末期與九〇年代初期政治不穩定期後的國家機器也逐漸轉型成新威權主義的型態¹⁶，以保障資本家的利益為其重要要務，因此，九〇年代的固定資本投資呈現穩定的增長趨勢，其中的民間投資額更是穩健地呈現每年正成長的趨勢，顯示出國家機器受到國內資本家的肯定，資本家也以實際的投資行動證明支持國家的立場。然而，相較於國內資本家在九〇年代對台灣投資的穩定成長趨勢，華僑及外資對台灣的投資則呈現不穩定的成長趨勢。僑外投資的明顯成長座落在台灣的國家機器提出「亞太營運中心」的跨世紀計畫，希望大幅吸引外商來台投資之際，對照於此時期之後的僑外投資量明顯增加的趨勢，可說明「亞太營運中心」的計畫對僑外投資具有吸引的效果與作用，同時也代表了國家機器在面對國際化回應上具有初步的具體成果。

國家機器在九〇年代努力進行台灣投資環境的改善，釋出了許多重大產業的中上游領域供企業界投資，並且將企業界納入國家機器內部運作後，穩固了大企業家對台灣的投資信心。到了一九九七年，已經有將近五成四左右的企業界看好台灣經濟¹⁷。隔年的外商評比，台灣在外商心中的吸引力更大舉從東亞地區的第六名提升到第三名¹⁸。這些數據顯示出國家機器的改革已經得到資本家的初步肯定，使得資本家願意與國家機器進行進一步的配合與合作¹⁹，強化的國家機器的合法性來源，然而，這也代表社會勢力相對於國家機器的能力而言，已經茁壯成為不可忽視的力量。

眾多台籍資本家納入國家機器的運作，並且將其投資擴大至各產業的中上游以充實台灣經濟的舉動，在表面上確實撫平了九〇年代初期資本家的眾多不滿情緒，並且支撐起國家機器的合法性，穩定了國家機器最基本的汲取功能，然而，隨著各方投資充實起來的國家機器合法性內容已經改變，國家機器如要繼續與社

¹⁶ 王振寰，**資本，勞工，與國家機器**（台北：唐山出版社，1993），頁 86-89。

¹⁷ 詳見**天下雜誌**，1997年6月，頁 63、66。

¹⁸ 詳見**天下雜誌**，1998年10月，頁 151。

¹⁹ 例如一九九六年李登輝提出的「戒急用忍」政策在當時並沒有遭受到強大的資本家抗議阻力。

會維持良好關係，鞏固其自主性的政策運作空間以繼續汲取社會資源的原因已經不再是冷戰時期意識型態的宣達，而是為企業創造更良好的投資環境。因此，新型態的國家機器在資本家參與入主之後，已經改善了國家能力的汲取功能，逐漸穩固了新國家機器的相對自主性地位，在此同時，由於社會其他勢力跟隨資本家腳步紛紛進入國家機器之際，馴化了國家機器對意識型態的堅持，台灣得以進入國族選擇的時代。

第三節 調控因素的影響

台灣近年來的民主化除了涉及到「政體」的合法性危機之外，還包括國家機器企圖對其國家能力實施與控制的範圍進行重新界定，因此，在此界定的過程中常會牽涉到「國家疆界」的定義問題。換句話說，國家機器在邁向民主化的過程中所致力的不只是要在台灣建立一個民主的「政體」，還要建構一個具有充分內在合法性基礎的「民主國家」，以彌補國家能力和自主性在中國代表權被取代後的逐漸消逝問題，同時，國家機器亦希望藉由民主政體與內在合法性等因素來區別其與過去政體、對岸國家之間的關係，企圖藉此重拾外在的支持。

然而，在此民主化的過程中，隨著合法性來源由外在的中國代表權邁向對內的合法性賦予時，整個國家與社會經常隨著選舉過程而牽涉到「本土化」的論述，本土化就此成為台灣民主化過程中相應而生的副產品。因此，台灣特殊的族群政治文化常隨著本土化論述的認同與否，衍生出特殊的政黨認同，而每次選舉過程中的政黨認同也就會被升高為不同的「國家保衛戰」，呈現台灣民族主義建國運動與中華民族主義保衛中華民國法統運動之間的拉扯²⁰。由於社會對國家和民族的疆界有不同的想像，加上對岸的中共政權對台灣具有領土的野心，使得台灣的民主鞏固道路充滿民族主義的情懷。

民族主義和民主之間因為兩者共同主張「人民的意志」是至高無上的，因

²⁰ 林佳龍，「台灣民主化與國族形成」，收錄於林佳龍、鄭永年主編，*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台北：新自然主義，2001），頁 218。

此充滿了緊張關係，兩者用不同的標準來界定「我族」。民族主義常用血統、種族、地緣、宗教或文化等特徵來區分我族與他族；崇尚自由主義的民主主義則傾向用公民權等政治身份來界定我族。Linz認為，對於存有認同衝突的分裂社會來說，如果民主要能鞏固，那麼國家所要努力建立的是依據政治社群做為國家認同而產生的民族主義將是「公民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自由民族主義」(liberal nationalism)或「土地民族主義」(territorial nationalism)來取代狹隘的「族群民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²¹。台灣在邁向民主鞏固與本土化的過程中也呈現出由「公民民族主義」取代「族群民族主義」的想像過程。對多數人來說，「台灣人」所指涉的已經是政治和地理的認同，大多數台灣人民也已經逐漸接受台灣（或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她的國土和國民範圍並不涵蓋中國大陸及其人民，更重要的是，大多數台灣人民已經可以接受以漸進和民主的方式來處理認同的衝突問題。

除了下層的社會人士逐漸形成「公民民族主義」的論述外，國家機器也在政治菁英的選舉競爭中朝向「命運共同體」、「新台灣人」和「公民民主自決」等「公民民族主義」論述方向匯合。捲入國家機器運作的政黨與政治菁英逐漸拋棄族群動員的論述，在持續不斷的選舉過程中，為了在群眾層次創造出具有最大利益、最廣共同性的政治認同、價值觀和成就感等選舉策略，政黨之間的競爭不再是零合鬥爭，而是談判、妥協和分配的政治過程。

因此，在邁向民主化深化的道路上，國家機器轉向對內尋求合法性的認可，也導致本土化論述內容伴隨民主化運動而生，台灣意識因此不斷增長。人民在民主化過程中紛紛對舊政權提出兩大質問：「舊政權從何而來？」和「誰統治舊政權？」²²。當這些問題如潘朵拉盒子般地被打開，在台灣的屢次選舉中被提起時，國家機器將隨著民主化的腳步邁向本土化。

²¹ 林佳龍，「台灣民主化與國族形成」，收錄於林佳龍、鄭永年主編，*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台北：新自然主義，2001），頁 219。

²² Donald L Horowitz., *A Democratic South Africa? : Constitutional Engineering in a Divided Society*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p. 41..

不可諱言，從傳統封建國家到現代民主資本主義國家的過程中，國家採進行動的範圍之自主性呈現出越來越弱的現象，但是國家卻因為觸及民間社會的程度越來越高，使得其執行政治決定的能力似乎越來越高²³。國民黨國家機器在集權政體走向民主化的轉型過程中也呈現同樣的現象，國家不能再將意識型態定於一尊，反而隨著合法性的向內強化而拋棄中國正統性的論述，企圖創造迎合此「疆域」內部社會人民的認同，也因為社會的共同參與，使得國家創造「想像共同體」的能力越來越高。國家認同趨勢的統計數據顯示出，政治民主化，尤其是選舉所帶動的政治參與，將台灣的國家與社會不分族群地捲入一個以台灣為疆界的「國族想像」過程，這個政治參與的過程使得社會各部門和團體有機會與國家部門進行觀念的溝通和利益的交換，而且有助於形塑以憲政制度為基礎的集體認同，如同霍布斯邦所提出的「國家創造民族，而非民族創造國家」的現象²⁴，台灣在國家機器的帶領之下，形成一個命運和利害的政治共同體²⁵。

第四節 國家能力與國家認同的關係

台灣的國家自主性與國家能力在一九四九年之後因為冷戰的國際環境所帶來的特殊地理、歷史因素而孕育出生命力，在一九七〇年代以前，國家能力的培養與自主性的展現在國際層次與國內地位都呈現毫無疑問的展現，並且牢牢控制住台灣的民間社會，呈現出強國家—弱社會的現象²⁶。然而，隨著中國代表權的喪失帶來國家自主性在國際環境的弱化，使得國家機器轉而尋求對內的合法性來源以支撐其國家自主性的展現，如此的國家能力來源渠道轉向過程劃開了台灣民間社會參與國家機器運作的契機，也使得國家機器開始正式面對其與台灣民間社

²³ Michael Mann, "The Autonomous Power of the State: It's Origins, Mechanism and Result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5 (1984), p.191.

²⁴ 霍布斯邦 (Hobsbawm, Eric J.) 著，李金梅譯，**民族與民族主義**（台北：城邦文化，1997），頁 10。

²⁵ 林佳龍，「台灣民主化與國族形成」，收錄於林佳龍、鄭永年主編，**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台北：新自然主義，2001），頁 235。

²⁶ 溫克勒 (Edwin A. Winckler)，收錄於張京育主編，**中華民國民主化**（台北：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92），頁 423-472。

會、與國際環境的關係界定問題。

國民黨政府轉向對內尋求國家能力擴張的首要步驟是保障財政汲取的管道來源。外來的美援等國際援助已經斷絕，所以國家更需要資本家對它的投資與支持以確保其財政的來源；其次，由於國家機器已經喪失大部分的國際官方舞台，因此，它更需要借重民間資本家非官方的國際影響力，藉以繼續聯繫台灣與國際的關係²⁷。因此，整個七〇、八〇年代的台灣國家機器呈現出其與台灣社會的資本家等菁英份子合作的過程，並且將國民黨政府國家能力的渠道來源成功地由國際支持轉向投資成長、財政成長、經濟成長等汲取能力的擴張。由於，七〇年代以後的資本家大多是台籍的色彩，再加上台灣特有的族群政治文化，使得資本家進入國家機器的過程中，馴化了國民黨國家機器對中國法統代表權的意識型態堅持²⁸，然而，此時國家與社會的結盟僅限於菁英階層，而不是廣大的「下層結構」。

八〇年代中期以後，由於台灣內部反對運動的興起以及國際上的中國大陸、東南亞等經濟的崛起，使得資本家以停止投資等具體行動抗議國家的無能政策，對於以經濟成長做為支撐國家合法性主要來源的國民黨政府來說不啻是個重大的打擊，國家機器的因應之道是選擇採用民主化與自由化的方法作為調解國家與社會矛盾的路徑，社會各階層的勢力因此大幅參與國家機器的運作，國家也因此取得其對內合法性的來源，同時在一連串的選舉、修憲等程序中，奠定「我族」的認知，造成「台灣人認同」上升，「中國人認同」下降的國家認同趨勢一去不復返現象。

此時期的中共威脅也發揮重要影響，因此台灣在民主化與選舉競爭的「拉力」因素下，由內而外把台灣人民拉在一起，並且在中共威脅因素中，由外而內把各族群台灣人民推在一起，使得民主化內涵深化了台灣的公民民族主義，逐漸形成了我族的認同。用Anderson的話來說，如果民族是一種「想像的共同體

²⁷ 王振寰，**資本，勞工，與國家機器**（台北：唐山出版社，1993），頁42。

²⁸ 林佳龍，「台灣民主化與國族形成」，收錄於林佳龍、鄭永年主編，**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台北：新自然主義，2001），頁238-241。

(imagined community)」，那麼九〇年代初期選擇民主制度企圖有別於過去政權與中共政權的國家機器，在民主化的洗禮下，已經建構了這個共同社群的疆界和內涵，成功創造「我族」的論述，並且有能力繼續將此論述的想像權力捍衛在台灣地區的國家與社會中，但並不包括海峽對岸的十二億中國人²⁹。

表 6-1：國家能力影響國家認同之關係

對國家認同的影響 國家能力指標	影響的強度	影響的內容
國際因素—歷史沿革	明顯	形成我族與他族的界線與重新定位
汲取因素—投資量	不明顯	弱化國家對民族主義意識型態的堅持
調控因素—民主化	明顯	我族論述內容的充實與圓潤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總而言之，在台灣國家認同趨勢的改變過程中，國家機器的能力展現扮演重要且積極的角色。國際因素的轉變開啟台灣國家能力內涵轉換，國家機器由國際支持轉而對內尋求台灣社會的合法性支持，進而突顯出台灣與中國大陸之差異處；其次，國家為了有效掌握對內汲取因素的來源，使得其對民族主義意識型態堅持出現軟化趨勢；第三，採用民主化調解社會矛盾的方法奠定國家機器對「我族」界線的認知，並且反饋回民間社會，形成民主化風潮下的國家想像運動（見表 6-1）。一九七〇年代到一九九〇年代的國家能力轉換過程是一動態的現象，也連帶影響台灣民眾的國家認同，同樣的，在深化民主、中國崛起、全球化等因素下，台灣的國家能力勢必會再被影響，也將會繼續引動台灣民眾的國族認知。

²⁹ 林佳龍，「台灣民主化與國族形成」，收錄於林佳龍、鄭永年主編，*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台北：新自然主義，2001），頁 238。